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史纲

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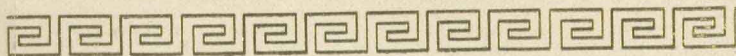
史前史 殷周史

翦伯赞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史纲

第一卷

史前史 殷周史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年·北京



翦伯赞
(1898—1968)

萬里長城遮不
斷
叢
漢人天是
一家

二
劉伯嶺
一九六
七月
日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令国人乱花迷眼。然而,淆乱之中,自有元气淋漓之象。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思想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至今日,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以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新变,探求中华现代学术之根基。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为本馆一大夙愿。自 1897 年始创起，本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有幸首刊了中华现代学术史上诸多开山之著、扛鼎之作；于中华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变迁而言，既为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作为对前人出版成绩与文化理念的承续，本馆倾力谋划，经学界通人擘画，并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终以此丛书呈现于读者面前。唯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并希冀其能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如此宏愿，难免汲深绠短之忧，诚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共襄助之。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0 年 12 月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以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整理者说明

《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写于抗日战争中期,即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关于当时全国和翦老所在的重庆的政治形势,撰写本书的背景,我在翦著《秦汉史·校定本序》中已做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1944年4月,本书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抗战胜利后,上海生活书店又以《新中国大学丛书》之一种于1946年10月、1947年5月两次再版。解放后,北京三联书店又于1950年3月再版。关于本书的内容,翦老“自序”说:“这本书上起开天辟地,下迄殷周之世,其所论述的范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史。”这次校定本书,既考虑到本书的内容,亦考虑到《中国史纲》第二卷的校定本已改题《秦汉史》,因之将本校定本改题《先秦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翦老的名著之一,也是他的力作之一。为撰写本书,他曾较长时期地、比较充分地做了理论和资料两方面的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从1930年开始参加“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就是这项准备工作的开始。这次“论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进步知识分子与拥护蒋介石的一批知识分子之间、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等问题而开展的一场重大的思想理论斗争。翦老是革命派方面的积极参加者之一。他以充沛的精力和泼辣的笔锋上阵,连续发表巨型论文,其中最主要的有《中国农村

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①、《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②、《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③、《“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④等,共有10余篇,30余万字。他在论战中所持的基本理论,后来都总结吸收到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出版的名著《历史哲学教程》^⑤一书中;他在论战中所探讨的主要历史问题,后来亦都总结吸收到本书和其他有关著作中。因此,本书的体例新颖,观点鲜明,内容宏富,理论性强。

本书最主要的特点有四个:

一、基本观点: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比较严格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论述史事、评价人物的。但并不空发议论,做到史料与理论统一,即所谓“史论结合”。对于旧的、传统的历史学不是一概抛弃,而是去其糟粕,继承并发扬其精华。关于此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 本书的体系是社会发展史的体系:中国传统的史学基本上是信古的,是以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帝王家谱来建立其体系的。内容以称道唐、虞盛世,讴歌圣君贤相为主。“五四”以后,自资本主义史学兴起,“疑古”思潮发展,曾对传说的史观有所冲击,可是这种史观也是唯心主义的。虽把有关上古的记载归入了“神话”和“传说”,可是从此中国上古的历史就剩下了一张白纸。本书的体

① 北平《三民半月刊》第5卷第6期,1930年11月16日出版。

② 共有上、中、下三篇,分别发表于北平《三民半月刊》第5卷第7、8、11期,1930年12月1日、16日、1931年2月1日出版。

③ 南京《劳动季报》第8期,1936年3月出版。

④ 上海《世界文化》创刊号,1936年11月16日出版。

⑤ 长沙新知书店1938年8月初版,桂林新知书店1939年8月修正再版。

系不是这样,而是把从北京猿人出现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这段漫长的历史划分为3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用了约26万字的篇幅,比较明确具体地概述了这段历史的基本情况,初步揭示了这段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就以上述原始社会为例,他不曾“传神书怪,捕风捉影”,而是把这段历史划分为“前氏族社会”和“氏族社会”两个时期。所谓“前氏族社会”后来多称之为“原始群”或“原始游群”,就是民族学上的“蒙昧时代”,其时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氏族社会”后来多称之为“氏族公社”,就是民族学上的“野蛮时代”,其时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每个时期又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书中对每个阶段的主要生产和生活特点,社会组织 and 婚姻关系,意识形态,都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理论分析和具体论述。^①

2. 本书对各个历史阶段的剖析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进行的:中国传统的史学是以记述制度和事件为主,静止地、孤立地看待问题。本书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论述,都把当时的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既把社会的各个主要方面分别论述,又把这些方面看作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例如在论述自商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时,都分章论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包括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社会关系,包括了阶级、等级、家庭、家族;政治状况,包括了制度、事件、重要战争等;意识诸形态,包括了宗教、哲学、自然科学、文学和艺术等。有史有论,明

^① 今天的学术界多将旧石器时代晚期划入母系氏族公社早期阶段;将新石器时代之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划入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阶段,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等划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确具体。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与“刑”为例,在介绍了“礼”与“刑”产生发展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之后,又指出:“所谓礼者,实即等级制度的教条,亦即封建社会制度之大经大法,所以别贫富,差贵贱,明上下,正身分者也。”“所谓刑者,乃是封建领主对农民行使统治的超经济的强制之权力的表现。”^①这是用画龙点睛的方法,揭露了当时的“礼”与“刑”的阶级本质。

3. 本书认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中国传统的史学是以历代的“圣君贤相”和“英雄豪杰”为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的。因之,史学著作虽多,几乎每部都是帝王家谱,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树碑立传。本书则把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放在主要地位,同时对他们受剥削、受压迫、过着悲惨生活的处境深表同情。如论述商代的奴隶制时指出:“一般自由民则已陷于饥谨线上,而奴隶大众的生活则比牛马不如。”^②论述春秋时期的封建领主制时指出:“春秋时代的农奴,大部分仍然生活于庄园制经济之中,也有一少部分变成了新兴商人的佃农。但他们都是在繁重的赋役榨取之下,过着饥饿的日子。”^③书中对奴隶起义,国人暴动,农奴反叛都有较多的论述,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断革命,才使王朝不断更替,制度有所发展、更新。因此,历代劳动人民的生产创造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4. 本书把中国的历史看作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与几千年来一直统治史坛的大汉族主义

① 见本书第371页。

② 见本书第235页。

③ 见本书第364页。

的、民族孤立主义的历史观是不同的。本书在每一重要历史阶段或朝代之前,都有专节论述当时的亚洲和世界形势,比较研究当时的中外社会历史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亦有专节论述当时“中国境内诸种族”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状况,以体现中国各族人民的祖先共同创造了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各族人民是平等的,都是祖国的主人。

二、主要学术论点:本书中的重大学术问题是很多的,翦老都有自己的见解,这里不能一一评述。就其中最主要的三个论点介绍如下:

1. 关于采用安特生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六个时期”的划分法问题:安特生,瑞典人,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1914至1925年在中国,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业顾问,曾在许多地方作过地质调查,又在河南、甘肃、青海等省作过考古发掘。仰韶文化就是他首次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的。安特生的工作对于中国的考古工作来说,是属于拓荒时期,除了他已发现的有限资料之外,其他能供参考者几乎没有。他当时把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六个时期,即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在考古工作中随时进行分类、排队、断代、分期是十分必要的。但安氏这样的分期是否科学,有多大的稳定性,都不是当时可以做出结论来的。在当时,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历史,采用安氏之说是一大进步。翦老说:“安氏的这种划分,至今考古学家尚没有提出新的论证,给以任何改变。因此,这种划分仍不失为研究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一个标准。”^①可是,此后的数十年间,尤其是解放以后,考古工作有极大

① 见本书第85页。

的发展,地下资料大量出土,新石器文化的类型划分一再有或大或小的变化。当然安氏之说也就成为旧说而无人采用了。

2. 关于夏代划入“氏族社会”晚期问题:翦老在本书中,把尧、舜、禹的所谓“禅让时代”看作是“氏族社会”的发展时期,把夏代看作是“氏族社会”的没落和向阶级社会转化的时期。所以这样,和文献不足征,考古资料少有关系。在当时的史学界中,不少人对“夏代”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直到解放初期,郭老还说:“唐、虞禅让是原始公社制留下来的史影”,夏代也是“一些史影”。^①后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尤其是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发现^②,夏代作为一个王朝、作为商朝之前的一个奴隶制国家而存在,逐渐为学术界的大多数人所承认。翦老在60年代前期主编《中国史纲要》,就把“夏”列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③说明至此时,翦老的观点已有改变。

3. 西周封建论:采用“西周封建论”的观点著书,尤其是撰写先秦史,几乎影响全局。因为这一论点所要解决的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界限在时间上的划分问题,所涉及的朝代不仅仅是西周,而是上起商朝,下迄秦汉,甚至到南北朝,时长约两千余年,其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与之有极密切的关系。本书把商朝后期看作是奴隶制度的没落时期,“武王伐纣”与“前徒倒戈”,不仅推翻了商王朝,也最后摧毁了存在一千余年的奴隶制度。西周王朝的建立,也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开始的时间。翦老把封建制度划分

①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第二版,第46、17页。

② 二里头文化遗址是1959年开始发掘的。地层堆积可分四期,第一期遗存的年代与夏纪年相当。

③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2章第1节。

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西周 to 战国时期,为封建领主制度,本书题为“初期封建社会”;第二阶段是从秦朝到清朝的鸦片战争以前,为封建地主制度,亦题为“中期封建社会”和“后期封建社会”。翦老早在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时,即持这一观点,此后数十年间不曾改变,直到去世。“西周封建论”直到今天,还为许多史学家所坚持,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一种重要观点,是影响史学界甚大的主要学术派别之一。

三、引用考古资料:本书最大限度地使用了中国的古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了经、史、子、集四部。由于历史久远,文献不足,仅仅以此来说明问题是有困难的。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就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①翦老还是十分珍视这部分文化遗产的。他说:“神话与传说,决非好事者之凭空谎造,而皆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换言之,它们都是历史上之一个突出的片断之记录。不过传之既久,由于语言异音,文字异形,便难免讹伪百出。”^②当然为数甚少。因此,翦老决定与慎重使用文献资料的同时,亦大胆地、科学地、充分地利用考古资料。有时还要用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资料。他说:辨伪学的发展,“中国文献上的古史资料便获得一些订正。”金石学的发展,“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两周之世。”商代器物 and 甲骨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之世。”新

① 《史记》卷一三《三代世表·序》。

② 见本书《序》第4页。

石器文化之发现,“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传说中之夏代,乃至尧、舜、禹及神农、黄帝之世。”猿人化石及旧石器文化之发现,“中国古史遂有上溯至中国历史之出发点的可能。”本书就是从“中国历史之出发点”述起的。翦老说:“这本书,我虽不敢说它已经把殷周及其以前的古史从神话的霉锈中洗刷出来,但至少它已使这一段古史显出了它本来的面目。一言以蔽之,从神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①

四、图文并茂:翦老的文章之生动,文笔之流畅,很早就为学术界所公认了。我在《秦汉史·校定本序》中曾讲到郭老于1942年11月19日写信给翦老说:“十七日信奉到,读后甚感兴奋。您的《中国史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②这里所说的《中国史纲》是指第一卷,就是本书。当年亦在重庆从事革命工作并熟悉此事的周宗琼同志对我说:“郭老为什么说要‘朗读’《中国史纲》?就是因为写的很生动,可以朗朗成诵。”^③

翦老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些方便,在本书中收有猿人化石和古器物图片43张,制作了历史地图12张,各种世系表、大事年表8张。这些图表可给读者增加一些史事的直观性和空间与时间的概

① 见本书《序》第5—6页。

② 《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8期。

③ 周宗琼,四川人。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她以一个女青年的身份,在重庆创办国防动力酒精厂,自任厂长,用资金支援革命。抗战胜利后,周总理亲自任命她为上海大孚出版公司总经理,坚持在国统区斗争。

念。那时的重庆,图书资料极端缺乏,编制这类的图表极不容易。翦老说:“这些插图、地图及年表之绘制,就占了本书写作时间的三分之一。”^①其艰苦性是可以想见的。可是这样做,既弥补了同类书向来存在的无图无表这一大缺点,又加强了本书的效果。

本书出版之后,在战时重庆的文化界顿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诽谤者有之,赞誉者亦有之;讥讽者有之,推崇者亦有之。总之,在这斗争激烈的旋涡中,不同阶级不同政见的人,对这突然出现的史学巨帙,其反应很不相同。广大进步的青年学生,尤其是一些身陷囹圄而坚持斗争的革命志士,曾把本书看作是他们的重要精神食粮之一。有时双手捧书,引吭朗诵:“现在,商代的奴隶大众打开了朝歌的大门,他们和西北的革命联军在胜利的呼号中冲进了朝歌。现在,奴隶大众怒吼了,绵羊变成了狮子,牛马变成了人,他们粉碎了他们的锁链,捣毁了他们的土牢,打开了巨桥的谷仓,散发了鹿台的宝藏;并且在神的面前,公然地侮辱了他们的主人。”^②在这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当前的时代精神融汇为一体,形成了一股无所畏惧的冲击力量。当时,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吴斯的题为《人的历史,真的历史》一文说:“历史研究不是为了夸耀往日的光荣,更不是为了再造一个历史上的太平盛世。从烟雾中显示出历史的本质,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乃是为了现在的战斗。一部好的历史书应该具有这种用处:告诉读者过去几千年的历史,真的历史,并且导引着你从过去想到现在。”^③作者认为

① 见本书《序》第5页。

② 见本书第203页。

③ 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6月19日《新华副刊》。